

檢視中共政權

四十年的文化景況(下)

周玉山

四、鄧小平時代的壓力與反彈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澤東終於去世。次月，華國鋒逮捕了四人幫，象徵文化大革命的告終。一九七七年八月，中共召開十一全大會，正式宣佈文革結束，並展開揭批四人幫的運動。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華國鋒漸被架空，中共進入了鄧小平時代。一九八二年五月，中共紀念延安文藝講話發表四十年，強調對毛澤東的文藝思想「一要堅持，二要發展」，堅持可謂不變，發展則似含有變數在焉。然欲明其真相，不能只看理論，必須考察實際，並與毛澤東的文藝政策做一比觀，方可奏效。

四人幫下台後，中共當局爲了轉移民憤，以示自己有別於前凶，乃一度允許大陸各地設立民主牆，並鼓勵追述文革罪惡的傷痕文學出現。結果此類文字有沛然莫禦之勢，在內涵上也不以控訴四人幫爲限，實際透露出共產制度的諸般缺點，中共驚惶之餘，就自毀承諾而加以阻擋了。一九七九年十月，鄧小平在第四次「文代會」上的部分論調，即與四人幫無異：「我們要繼續堅持毛澤東同志的文藝爲最廣大的人民群眾，首先是爲工農兵服務的方向²⁴。」周揚也在同一會議上表示，他不贊成以自然主義精密細緻的方式反映傷痕，以免造成不利的思想和情緒。由此可知，中共推許傷痕文學純爲一時之計，無意予以全面肯定。

一九八〇年二月，當時尚爲鄧小平親信的胡耀邦，在劇本創作座談會上重申，文藝要表現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並點名譴責沙葉新的「假如我是真的」。此言一出，該劇旋遭禁演。一九八一年二和三月，中共中央相繼下達第七號和第九號文件，前者針對文藝界而發，命令作家要在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指導下，批判「鼓吹錯誤思潮的作品」，同時必須接受共產黨的領導，「無條件地同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不允許發展與中央路線、方針、政策相違背的言論」。後者則授權高級幹部，可以逮捕民主運動人士，扣押地下刊物，對於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活動分子「不能手軟」。傷痕文學至此，正式被中共封殺了。

稍後的一九八一年四月，解放軍報即公開批鬥白樺的劇本「苦戀」，人民日報、北京日報、上海解放日報以至紅旗雜誌，都加入圍剿的陣營。七月十七日，鄧小平親口質問：「『太陽和人』，就是根據劇本『苦戀』拍攝的電影，我看了一下，無論作者的動機如何，看過以後，只能使人得出這樣的印象：共產黨不好，社會主義制度不好。這樣醜化社會主義制度，作者的黨性到那裏去了呢？²⁵」八月三日，胡耀邦也在思想戰線問題座談會上表示，「苦戀」不是一個孤立的問題，類似脫離社會主義的軌道、脫離共產黨的領導、搞自由化的言論和作品不止一端，「對這種錯誤傾向，必須進行嚴肅的批評而不能任其泛濫」²⁶。凡此用語，幾與解放軍報全同，白樺因此被迫自我批評。九月，他寫了書面檢討，但未獲通過。十月，鄧小平親令批判「苦戀」的文章在文藝報發表，人民日報奉命轉載，白樺終於公開向中共認錯與致謝。鄧小平此舉，令人想起五十年代毛澤東授意下的交心運動，

兩者如出一轍，都是共產黨「不殺身體殺靈魂」的傑作。

一九八二年五月，中共紀念毛澤東延安文藝講話發表四十年時，除主張對其文藝思想既要堅持又要發展外，還規定作家必須堅守四項基本原則，克服文藝工作自由化的傾向，勇於歌頌新人新事新思想，熟悉群眾火熱的鬥爭生活等。六月，「文聯」舉行第四屆全委會第二次會議，又通過了文藝工作者公約，明定認真學習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等，可見大陸作家並未因毛澤東已死，而獲真正的解放。

值得世人留意的是，何謂「一要堅持，二要發展」？中共此時重申，毛澤東文藝思想的重點組成部份——延安文藝講話等論著，表明了文藝首先是為農工兵服務的方向，從過去到未來，其根本精神都是中共文藝的指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就是對毛澤東文藝思想的重要發展。周揚也承認，文藝從屬於政治的看法不正確，但不提此語，並非表示文藝與政治無關，可以脫離政治。「三中全會以來，文藝的主流是好的，必須肯定，但是也有錯誤，也有支流。隨著對外開放和對內搞活經濟的巨大政策轉變而來的思想戰線上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傾向，就是不容忽視的支流。強調文藝為社會主義服務，就要反對這種傾向」²⁷。周揚在文革期間被扣上手銬，單獨囚禁多年，復出後的發言，曾被視為代表官方，不見轉圜的餘地。

由此可知，鄧小平對毛澤東文藝思想的發

展，不脫文藝為政治服務的本意。所謂人民，所謂社會主義，在共產黨的觀念中都有特殊指涉，與一般認定者不同。例如「人民政協共同綱領」中，人民的定義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以及從反動階級覺悟過來的某些愛國民主份子」²⁸。這還是含有強烈統戰意味的從寬解釋，但絕非指全民，自不待言。社會主義在彼等心目中，更是共產主義的過渡和必經階段。此二名詞原在法律和經濟上各有要涵，中共則於政治上壟斷它們，據為己用。換言之，「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其實就是為共產黨服務。中共亦宜承認此點，方能解說作家何以必須堅守四項基本原則，而不與「為人民服務」重點相違。四項基本原則的核心，正是堅持共產黨領導。

果然，中共又於一九八三年發動了新整風。該年十月，鄧小平在十二屆二中全會上，提出思想和文化戰線清除精神污染的問題，正式揭開對理論界和文藝界的整肅。中共自稱近年來造成污染的主因有二，一為封建主義殘餘的影響，二為資本主義思想的侵蝕，後者尤為其所懼恨，說明中共歷來對作家示警的無效，也暴露外來思想對大陸的衝擊。清污運動聲中，穿制服的文藝官員紛紛表態，加入批評和自我批評的行列，白樺的「吳王金戈越王劍」、徐敬亞的「崛起的詩羣」等皆遭批判。白樺此部歷史劇所獲的罪名，是和社會主義的精神背道而馳，「苦戀」也被舊話重提，指其表現人的

異化，顯示共產黨在壓抑和摧殘人性，因此和張笑天的小說「離開原上草」一樣，都在醜化社會主義制度。「苦戀」帶動了大陸文藝創作的異化，並隱喻毛澤東為災難的根源，與鄧小平反覆申說的「毛澤東功績第一，錯誤第二」不符，中共因此對白樺的餘恨未消。

然而鄧小平近年來倡言的四個現代化，必須借重知識分子的智慧與力量，因此中共在整肅思想界與文藝界之際，又恐後遺症太大，既不利於建設，且影響外資外才的吸收，鄧小平的文藝政策不免表現收放兩難的景況。一九八四年八月中旬出版的紅旗雜誌就強調，文藝評論時的澆花與鋤草缺一不可，因為鮮花與雜草間的矛盾鬥爭，是此消彼長的²⁹。該誌聲稱要做到毛澤東的三不主義——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其實這與雙百政策——百家爭鳴、百花齊放，都是毛澤東的「陽謀」，劣跡彰彰在世人耳目，中共現又引為號召，不啻喚醒大陸作家對毛澤東猶新的記憶，實難謂為高明。一九八五年十月底，「作協」召開工作會議，王蒙以常務副主席的身份告訴作家們，要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樹立革命的世界觀，深入火熱的鬥爭生活，了解共產黨事業的根本利益等。他還指出，「作協」第四次大會所提保證創作自由，其實是有要求的³⁰。在中共的要求下，劉賓雁的「第二種忠誠」和「我的日記」，王培公編劇、王貴導演的「WM」，先後遭到封殺。事實證明，在鄧小平的統治下，作家依舊無法安枕，不願在毛澤東陰影下生

活的人，當然就會適時求去了。

一九八七年初，劉賓雁、王若望和科學家方勵之，皆被中共開除黨籍，可謂劣幣驅逐了良幣。王若望一如劉賓雁，一九七九年復出後不改其志，主張以文學為媒，行不平之鳴，強調真實之必要，並以關懷民間疾苦為己任。由於大陸文藝界受中共的壓制，使得反映現實生活的作品日少，粉飾太平的文詞日多，他深為此憂，因此和魯迅一樣，矢志寫不瞞不騙的文章。大陸文壇說他是未來學的預言家，因為從一九八〇年起，每年春季都要刮出一道冷風，為王若望不幸言中，一九八七年首當其衝的正是他本人。由此亦可證明，鄧小平未能忘懷毛澤東的文藝政策，且已繼承了毛澤東的部份手法。

方勵之以「中國的沙卡洛夫」著稱，顯然服膺培根的名言：「知識就是力量。」他呼籲大陸知識份子挺起脊梁做人，不要唯上是從，應該自我貴重，一旦如此，力量即出。同時，大學必須是思想中心，要醞釀自由民主的空氣，培養愛好真理的意識，轉變高等教育的方向，使知識份子成為社會進步的主導。此種蔡元培式的民主辦學構想，一度獲得中共稱許，後又猛遭批鬥，其反覆無常可見。民主與人權的定義不止一端，方勵之的觀點接近盧梭，而時代性過之。他確信民主本身的涵意，首先就是人人有自己的權利，然後組成社會，所以不是上面給的，是與生俱來的。人權在大陸非常陌生，其實此說不足為奇，即人類天生具有生存

、生活、婚姻、思想、受教育等權，一如自由、平等、博愛，是自然資源，也是歷史遺產，肯定值得爭取，這才是真正的民主。由此可知，民主與人權密不可分，是天賦的，非恩賜的，但中共既以退化到黑暗時代，盧梭式的言論自如洪水猛獸。

抑有甚者，方勵之公開反對用馬克思主義指導科學研究，「所謂指導總是做出錯誤的結果，從來沒有正確的成果。解放以來，所有的學術批判，沒有一次是正確的，百分之百的錯誤」。談到好好學習，原為學生的份內事，「但是說這一機會是黨和國家給你的，是完全錯誤的」。至於深圳青年報請鄧小平退休，他認為是很自然的現象，「我覺得這當然是大家表示的意思，是可以的」³¹。凡此言論，在中共看來可謂大逆不道。方勵之正如魏京生，鳴鼓而攻的對象，上自馬克思，下至鄧小平，後者既有逮捕魏京生的經驗，整肅方勵之實屬必然。一九八九年四月中旬起，大陸爆發大規模的民主運動，中經五四運動七十年等因素的激盪，愈見波瀾壯闊。六月四日，中共中央下令軍隊進入天安門廣場，展開慘絕人寰的屠殺，北平大學生及市民死傷無數，舉世為之震驚。大屠殺過後是大逮捕，方勵之夫婦和多名學運領袖遭到通緝，中共的十一「國慶」，遂在紅色恐怖中渡過。四十年來家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山河，開文化大革命後的又一浩劫，至今未休。

前此，方勵之在一九八九年一月六日即致

函鄧小平，建議實施大赦，特別是釋放魏京生及所有類似的政治犯。此函既出，北平文化界北島、老木、吳祖光、李陀、冰心、張潔、吳祖細、湯一介、樂黛雲、張岱年、蕭乾、蘇曉康、金觀濤、李澤厚、包遵信、劉青峯、高泉、蘇紹智、王若水、陳軍等卅三人，於二月十三日以公開信連署響應，三月十四日，又有戴晴、嚴家其、遠志明、史鐵生、鄭也夫、毛崇杰、周輔成等四十三位文化界人士加入聲援，而中共置若罔聞。四月廿一日，包遵信、吳組細、嚴家其、高泉、李澤厚、于浩成、謝冕、鍾璞、北島、蘇曉康、鄭義、戴晴等四十七名知識分子又致函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呼籲加速大陸民主進程和政治體制改革，清除各級黨政機構中日趨嚴重的腐敗現象，解決各級政府普遍存在的軟弱低能狀態，實現憲法規定的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確保大眾傳播媒介的輿論監督功能。「我們建議，黨和國家領導人認真聽取學生的願望和要求，直接與學生們平等對話，汲取一九七六年天安門事件的歷史教訓，不能置之不理。置之不理，容易激起學生們的過激反應，不利於全國人民同心同德實現中華民族的現代化大業」³²。結果，中共以坦克機槍見覆，製造了第二次天安門事件，不讓四人幫專美於前。

大陸文化界此時義無反顧，投入支援學運的巨流。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嚴家其、包遵信、鄭義、徐剛、王魯湘等三十餘位知識分子，對中共的不仁與無義發出了怒吼，直指中

國還有一個沒有皇帝頭銜的皇帝，一個年邁昏庸的獨裁者。「在今天，我們向全中國、全世界宣佈，從現在起，同學們一百小時的偉大絕食鬥爭已取得偉大的勝利。同學們已用自己的行動來宣佈，這次學潮不是動亂，而是一場在中國最後埋葬獨裁，埋葬帝制，偉大愛國民主運動」(3)。大陸知識分子的反撲，至此達一高潮。他們身無半敵而心憂天下，手無寸鐵而不畏橫暴，展現了最高的道德勇氣。

五、結 論

文化人皆為知識分子，中共文化政策的主要受害者亦為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接近中國古謂之士或儒，不但是社會的楨幹，而且是平民的導師，如韋伯所說：「中國儒者雖由禮儀訓練而成，實由對俗界士君子的教育而來」(4)。「中國知識分子由於最早從宗教中解脫，又多來自民間，因此和西方相較，尤其人文精神與平民性格。不僅如此，他們每以國家興亡為己任，孔子主張「見危授命」，曾子期許「任重而道遠」，孟子強調「威武不能屈」，以及禮記所載「載仁抱義，雖有暴政，不更其所」等，都有無數的知識分子身體力行，而在青史留名。共產黨的文化特質為階級性，無產階級文化既偏重社會精神生活的控制，則對文化人或知識分子尤為敏感，從馬克思到鄧小平，都有敵視知識分子的紀錄。馬克思本人雖為一介書生，但在論及剩餘價值時，貶抑精神勞動在生產過程中的地位，又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

斷言，只有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分離時，才開始真正的分工。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則指出，精神勞動者逐漸形成一個脫離直接生產勞動的階級，為了自己的利益，永不錯過機會，把愈來愈沉重的負擔加在勞動群眾身上。因此，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眼光中，精神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嚴重對立，而且前者迫害後者，罪不可追。

毛澤東受馬克思影響，認為知識分子帶有主觀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傾向，思想往往是空虛的，行動往往是動搖的。他又繼承列寧和史達林的觀點，主張改造知識分子，命令他們向體力勞動者學習。及至文革期間，知識分子的身心更飽受摧殘，民族生命力亦遭嚴重破壞。

鄧小平在一九五七年反右鬥爭時，充當毛澤東的助手。該年十月十九日，他在人民日報發表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明言要用揭露、孤立和分化的方法，「有的還要用懲辦和鎮壓的方法」(5)，來處置數以百萬計的知識分子。他同時表示，思想改造是一個長期任務，可能還需要十年以上。無獨有偶，他在一九八七年向自由化宣戰時，又強調鬥爭應該進行「至少廿年」。明瞭以上背景，我們在驚見一九八七年神州濺血時，又不難感到其來有自，而對大陸知識分子的反彈，也就不覺意外了。

共產主義本為一種意識形態，文藝則為所意識形態中最引人入勝的一環，正因此，中共特重文藝，後者成為政治的寒暑表，中共的知識分子政策以及文化政策，可以文藝政策

為代表。歲月不居，毛澤東業已離世多年，死靈魂仍纏附於中共的文藝政策中，也禍延到大陸作家身上，可謂事有必至。毛澤東身兼中共的列寧和史達林，此種雙重身份，已成歷史定論。因此，蘇共可以全面批判史達林，中共則無法全盤否定毛澤東。鄧小平在第四次「文代會」上的祝詞，現已被中共奉為文藝工作的最高指導原則，其中就不止一次稱頌毛澤東及其思想。一九八三年七月出版的「鄧小平文選」，提及毛澤東之處更達五百廿一次，且語多揄揚。鄧小平有關文藝的言行，證明他自己也無法擺脫毛澤東的陰影。

甚至，他根本無意全面擺脫。中共在據有延安根據地之前，已於文化戰場上先操勝券，一九四九年大陸之赤化，三十年代文人亦有功焉。毛澤東昔日得逞的啟示，鄧小平心領神會，對作家也就既拉攏又威嚇了。時至今日，大陸作家欲發表作品，仍須通過層層把關，與毛澤東時代殊無二致。「有創作自由，下筆如有神；無創作自由，下筆如有繩」。所謂社會主義的創作自由，既以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為前提，下筆有神就成為不少作家的奢望了。

政治原是一種藝術，重視中庸之道。對共產黨而言，藝術却是政治的一部份，因此有文藝政策之設。早在三十年代前夕，梁實秋在與魯迅論戰時就指出，文藝而可以有政策，本身就是名詞上的矛盾。蘇共頒佈的文藝政策，只是兩種卑下心理的顯現：一是暴虐，以政治手段剝削作者的思想自由；一是愚蠢，以政治手

段強求文藝的清一色⁶⁰。昔日的蘇共如此，今日的中共亦然，因為中共的文藝政策原就脫胎於蘇共。大陸作家近年呼籲，要改變驚弓之鳥的現象，首應消滅驚鳥之弓。此弓即為文藝政策，長期以來由中共領袖和文藝幹部掌握，偶有鬆手之時，但無棄弓之日，從過去到現在，莫不如此。在文藝、文化乃至政治領域寄望鄧小平的人，註定要以失望收場，因為他們忘了一項常識：鄧小平是一名執政的共產黨員，假如他放棄共產黨領導，就不可能執政了。果然，鄧小平不惜以大陸知識青年的血染廣場，命喪街巷，證實此說為真。

六四慘案之後，我們再看中共近年倡言的文化體制改革，已覺無甚意義，而一九八八年「河殤」的被禁，於今觀之，實屬和風細雨。屠殺稍歇，圖說與追捕同等重要，中共文宣幹部的忙碌可知。因此，文化為共產黨服務，作家必須管制，作品不免受檢，創作自由徒託空言等，皆為中共文化政策的一貫不變處！從現在到未來，我們難以想見，鄧小平及其幹部許諾的園子真會百花齊放，就像毛澤東早就許諾過的一樣。

註釋

- 24 鄧小平：「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詞」，人民日報，一九七九年十月卅一日。
- 25 鄧小平：「關於思想戰線上的問題的談話」，收入「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編，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吉林人民出版社重印，一九八二年八月第一版，一九八二年九月吉林第一次印刷，下冊，八七九頁。

26 胡耀邦：「在思想戰線問題座談會上的講話」，收入「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同註25，八九八頁。

27 周揚：「一要堅持，二要發展」，人民日報，一九八二年六月廿三日。

28 「人民」，見「增訂中共術語彙解」，同註22，二二頁。

29 高占祥：「開一代文藝評論新風」，紅旗半月刊，一九八四年第十六期，一九八四年八月十六日出版，一五頁。

30 「王蒙在中國作協工作會議上說：在堅持創作自由的同時須強調作家的社會責任」，人民日報，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六日。

31 方勵之：「我們正在寫歷史——方勵之自選集」，台北經濟與生活出版公司，一九八七年九月第一版，二〇一頁。

32 「四十七名知識分子公開信」(四月廿一日)，收入張京育主編：「自由之血民主之花——中國大陸民主的坎坷路」，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出版，民國七十八年八月初版，九九頁。

33 「北平知識分子『五一七宣言』」，收入張京育主編：「自由之血民主之花——中國大陸民主的坎坷路」，同註32，二四八頁。

34 引自胡秋原：「古代中國文化與中國知

識分子」，台北學術出版社，民國六十七年十月台四版，八頁。

35 鄧小平：「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一九五七年九月廿三日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擴大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人民日報，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九日。

36 梁實秋：「所謂『文藝政策』者」，收入「偏見集」，復收入「梁實秋論文學」，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民國六十七年九月初版，二九二頁。

中原音韻新考

王潔心編述

卅二開 平裝一八八頁 定價七十二元

本書共五章，首先介紹「中原音韻」一書之來源與特點，以及元代周德清撰此書之目的及其在曲學上之價值與影響。指出以往音韻學家研究考證「中原音韻」時各種錯誤之觀點，推證所謂「中原」究指何地，從歷史因素，四聲調值，尖團字，ㄩ<下，豫東土音，閉口音等許多已有的可信資料上，考出「中原音韻」之標準音乃豫東語音而非「大都音」，此外並解釋有關該書幾個無人能解之疑點，最後為校正「音注中原音韻」。另附錄多篇，述其資料來源與研究經過。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卅七號 郵撥〇〇〇〇一六五一號